

齐涛 主编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检讨

黄朴民 刘后滨 白效咏 著



泰山出版社

齐涛 主编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检讨

黄朴民 刘后滨 白效咏 著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检讨/黄朴民, 刘后滨, 白效咏著.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09. 4
(资政通鉴)
ISBN 978 - 7 - 80634 - 721 - 8

I. 中... II. ①黄...②刘...③白... III. 中国—
古代史—研究 IV. K2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794 号

著 者 黄朴民 刘后滨 白效咏
责任编辑 葛玉莹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路渊源

资政通鉴

中国历代王朝崛起检讨

出 版 泰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23466
发行部(0531)82025510 82020455
网 址 www. tschs. com
电子信箱 tschs@sohu. com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65 × 240mm
印 张 24. 75
字 数 228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634 - 721 - 8
定 价 38. 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绪 论	齐涛	/1
(一)文治与武功		/1
(二)扩张与内凝		/9
(三)迸发与渐进		/16
一 制定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		/21
(一)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以及表现		/22
(二)历史上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特色		/31
(三)历代王朝崛起阶段安全战略的局限性		/41
二 “大一统”理念与历代王朝崛起的关系		
——以秦汉王朝为例		/48
(一)“大一统”理念:秦汉统一并迅速崛起的文化基石		/48
(二)“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		/59
(三)“大一统”与秦汉历史文化地位评价		/72
三 逆取顺守:妥善处理功臣问题		
——从刘秀与赵匡胤的气度与识见说起		/80
(一)社会政治生活转型背景下的功臣进退症结		/80
(二)诛杀功臣的后遗症		/90

(三)“允冠百王”:刘秀的雅量	/98
(四)“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的政治智慧与北宋崛起	/117
四 举贤任能:用人得失在王朝兴盛中的关键作用	/129
(一)齐桓、晋文霸业与用人	/130
(二)汉武帝的“不拘一格用人才”	/158
(三)唐太宗的驭臣之道	/179
五 殊途同归:选择正确统治思想与王朝兴盛的关系	
——表章六经与大汉帝国的盛世缔造	/200
(一)汉王朝的建立及其统治指导思想的探索	/201
(二)西汉王朝统治思想的转型与儒学独尊格局的形成	/221
(三)儒家学说对汉帝国全面崛起的深远影响	/237
六 纳谏正身的君道与安民抚众的政纲	
——从贞观之治与开天盛世看王朝崛起的关键环节	/267
(一)贞观之治中的为君之道与安人之道	/268
(二)魏徵与贞观治道政术的探讨	/278
(三)“贞观之治”的三大特征	/286
(四)从一代女皇到开天盛世	/295
(五)“治世”与“盛世”	/305
七 监督与制衡:王朝崛起的重要保障	
——以北宋仁宗之治为例	/313
(一)宋朝的武功与文治	/314
(二)监察体系的逐步完善	/321
(三)仁宗朝台谏对皇权、相权的监察	/328

(四)仁宗朝台谏检讨	/346
八 落日亦辉煌:华夷一统与康乾盛世	/352
(一)民族融合与国家安全	/353
(二)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362
九 适时调整:历代王朝崛起过程中的有力杠杆	
——以汉武帝身后国策转变为例	/368
(一)汉武帝晚年的社会政治危机	/369
(二)汉武帝身后的三种国策抉择模式	/372
(三)汉武帝身后国策抉择意义简评	/379
参考文献	/383
后记	/388

绪 论

齐 涛

此处之“崛起”是为了论述方便而引进的当代政治概念，它与以往中国政治史上所讲述的“盛世”或“治世”相比，并无本质不同，只是研究者的视角与切入点的不同。所谓崛起者，在王朝发展史中，特指某一特定时代或某位帝王在位之时王朝的强盛与繁荣；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特指某一国家或王朝跃居于其毗邻的列国之前，或跃居于世界各国前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施加着重大影响。在中国王朝的发展史上，许多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盛世或治世，既明显地过于其前代，又在周边地区事务或国际事务中产生着重大影响，称之为“崛起”当更为确切。

（一）文治与武功

追求国家或王朝之兴盛，是每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与抱负，孔子所孜孜以求的“克己复礼”，就是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要成就周文王、周武王式的王业，也就是王朝的兴盛。不过，也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对于如何造就盛世、成

就王业发生了种种争论，最为著名的是“王道”与“霸道”之争。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对这段王霸之论，朱熹集注引邹氏言：“以力服人者有意于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无意于服人，而人不能不服。从古以来论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① 还有一些思想家对王霸之争加以折衷，提出“杂王霸之道而用之。”此说实际上成为当时列国争霸之君主所普遍遵循的法则，而且还影响到此后两千年各王朝的统治者。西汉宣帝就明确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②

中国历代王朝之致治之君基本都是杂王霸之道而用之，霸道者，以力服人者也，外示以兵，内示以刑。王道者，则是以德服人者也。何谓服人之德？孟子讲了五条内容。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而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

① [宋]朱熹：《孟子集注·公孙丑上》。

② 《汉书·元帝纪》。

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霸道向不可缺，但王道却始终各王朝谋求崛起的首要旗帜，尽管王霸之道的目标都是“无敌于天下”，殊途同归，但霸道在王道面前一直未能摆脱旁门左道的低等门楣。其始作俑者便是孟子。在这一元范的设定下，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无论是治世还是盛世，都浸透着浓重的王道情结，加之中国历史、社会以及周边环境的种种特性，使得中国历代王朝之崛起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所谓中国历代王朝崛起的中国特色是与西部世界之崛起者相比较而言，具体可从文治与武功的关系观察之。众所周知，文治与武功是造就王朝崛起的两大基本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别。但在两者的关系上，中国王朝与西方国家却存在着明显差别。中国王朝重文轻武，首先看重的是文治，武功多是用来平定内乱或抵御外患，穷兵黩武者颇受上下讥议，因而，中国历代王朝中的崛起基本属于内治型崛起。而西部世界诸国虽然也同样看重文治，但对武功更有情钟，而他们的武功又多以开疆辟土为首要目的，属于外向型崛起。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将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作比，他们是公元前后并峙于东西方的两大帝国。其崛起

^① 《孟子·公孙丑上》。

的作为却各有不同。

汉王朝起于公元前 207 年，止于公元 220 年，其间有短暂的王莽新朝，因此，汉王朝又被分割为西汉王朝与东汉王朝，统称两汉。两汉王朝，可称述的崛起时代有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以及东汉的明章之治。

文景之治的主要标志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全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其成效也体现在这一点上。文帝即位之后，贾谊曾直陈当时经济之凋弊：“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① 经过文帝与景帝两代三十年左右的治理，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史称：“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② 经济繁荣如是，文景时代的武功仅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可述焉。对外敌匈奴，仍继续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对周边其他政权，也是以德怀之，并不轻启战衅。比如，秦王朝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受封为南越王。吕后主政时，赵佗自称南越武帝，不断进犯西汉城邑。文帝即位后，不仅未出兵相攻，而且还修治赵氏在真定的祖坟，定期祭扫，又将其亲属召至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② 《史记·平准书》。

京城，封官重赏。然后，派陆贾赴南越，劝其去帝号。赵佗被这一德政感化，废帝号称王，“愿长为藩臣。”^①

汉武帝时代武功赫赫，似乎与文景迥然不同。北伐匈奴，南平南越，又通西域，降滇王，形成了东部世界无可匹敌的强大王朝。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武帝之武功，可以看到三个现象：其一，武帝时代的武功大多是防御性反击，而非进攻性拓边。如，匈奴在秦汉之际得以强大，不断南下，袭占了秦之河南地。武帝之前的汉王朝以和亲为手段，试图缓解匈奴之攻势，但效果不太明显。至武帝时代，匈奴仍不断袭扰，武帝凭强大的国力，对匈奴发起了一系列反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入侵汉之上谷、渔阳两郡，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军迂回至陇西，对河套地区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加以围歼，收复了河南地。第二次是公元前121年。面对匈奴占据河西不断攻扰，武帝派霍去病二度远征，大破匈奴主力，收复了河西地区，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第三次是公元前119年。鉴于匈奴又从右北平郡、定襄郡南下袭扰，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远赴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均获大胜，使得“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②其二，武帝时代的军事活动大率止于反击而已，并未因反击之成功，攻城略地，或以之为跳

① 《史记·南越列传》。

② 《汉书·匈奴传》。

板，实现大规模的战略征服，只是通过反击筑就屏障。其三，武帝时代之文治也灿然可观，对于中央与地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要改革，在经济政策上也启动了若干影响后世的新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上的独尊儒术更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一时代的武功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国力的衰竭、民生的困弊，在武帝末年的王朝上下包括武帝本人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武帝还专门下轮台罪己之诏，反思用兵之过，用刑之苛，赋敛之重。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①。还是回到了文治的轨道上。

明、章指东汉第二代和第三代君主明帝与章帝，“明章之治”是文治武功的综合体现，文治是其基本内核。东汉开国之君刘秀即明确其立国大纲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② 这是把儒、道的做人之道揉合为治国之道，通篇都是倡导文治，反对黩武。其中“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是多数帝王的通识。明章两帝也认真地实践着

^① 《汉书·西域传》。

^② 《后汉书·臧宫传》。

这一大纲。他们治国都能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注重选用循吏，遵行柔术。加之水利兴修、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以及赋民公田、假民公田等举措，使这一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又呈现出繁荣与安定。与之同时，针对两汉之交的动荡中匈奴势力的再度崛起，明章时代多次派兵反击，至公元 90 年，终于将匈奴主力完全击溃并迫其西迁，尽管东汉军队数度远征至漠北，甚至出塞五千里，但得胜之后也未据有匈奴故地，而是“刻石纪功而还”。

罗马帝国的历史起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罗马城邦国家统一意大利半岛，建立共和制帝国，终于公元四世纪末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落自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公元三世纪，为发展繁荣期，第二段落自公元三世纪到东西罗马分治，为衰落期。第一段落有三个发展的高峰时代，每一个高峰时代虽然也都有相应的制度建设、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进步，但扩张与武功一直是三个时代的共同主题。如第一个高峰时代是共和制帝国的崛起期，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罗马人统一意大利半岛后，即开始了强力的对外扩张，当时统治中心位于突尼斯的迦太基人是地中海西部地区的霸主，其版图包括了北非的西部，西班牙的东南部和南部，西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以及西西里岛的大部分。罗马人与迦太基人进行了三次大战，自公元前 264 年到前 146 年，达一百一十八年之久。最后，以罗马人的胜利而告终。与

之同时，罗马人还完成了对希腊、马其顿、小亚细亚与西班牙的征服，其地域东起小亚，西抵大西洋，囊括了亚洲西部、西班牙大部、北非一部、巴尔干半岛以及地中海上的若干岛屿。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雏形初见。

第二个高峰是元首制帝国时代的屋大维时期。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先后经历了克拉苏、庞培、恺撒的“前三头同盟”统治和安敦尼、雷必达、屋大维的“后三头同盟”的统治，到公元前30年，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称元首，实乃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在他统治的时代，帝国内部相对稳定，被称作“罗马的和平”时代。就在这一时代，罗马帝国仍继续着武力扩张，完全征服了西班牙、高卢，进占了阿尔卑斯山区和多瑙河流域地区，其疆域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至大西洋，南到撒哈拉沙漠，北抵多瑙河与莱茵河。

第三个高峰是安敦尼王朝的前半期，安敦尼王朝起于公元96年，止于公元192年，历经六帝，因政权之稳定，经济之发达，被称作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其中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前三位帝王时代，这一时代内部矛盾缓和，官僚机构也得以完善，而帝国的疆土也扩展到空前绝后的规模，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北抵达西亚，南括北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①

^① 以上参见齐涛主编：《简明世界通史》上编第三章的有关内容，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

从罗马帝国与汉王朝崛起时代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大帝国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体现在文治武功的不同侧重上，还有着其他内在的深层原因。

（二）扩张与内凝

正因为中国王朝与西部世界诸国崛起的特色不同，其崛起的后置影响也各不相同，就国际影响而言，西方诸国的崛起往往带来文明体与民族间激烈的碰撞与冲突，往往可以形成跨文明的洲际帝国，从而改写政治地理格局并形成文明的交融与新生。而中国王朝的崛起所带来的往往是文明体自身的内凝，除特定的蒙古帝国外，从未形成超出所在文明体的帝国。它也带来文明的交融，但其特点是对外来文明的吸纳和在本文明区间内的辐射，造就的不是文明的新生，而是自身的升华与发展。

就西方世界诸国看，自上古到近代，凡崛起者多可形成跨文明的洲际帝国，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由海外殖民而形成的英、法等帝国，也属于类似情况。这类帝国与中国王朝的崛起者对于国际环境的影响大不相同，我们可以大致处于同一时空的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相比较。

唐王朝起于公元618年，止于公元907年，其崛起的时代在太宗至玄宗之间，亦即自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王朝崛起时代

的周边战略与对外政策有着鲜明的文治特色，其对外武功不以领土扩张、财富掠夺为目的，而是以德怀远，实行宗主册封、朝贡与归化政策。

如，唐太宗贞观年间，针对突厥在北方的侵袭，曾发大军北征，一举攻灭东突厥，俘颉利可汗。唐王朝并未占其故地，开疆辟土，而是将东突厥部众一分为四：一部分安置在今陕西北部的佳县、榆林、靖边一带，设立了祐州、化州、长州三个都督府；一部分安置在幽、并、辽西一带，设立顺州都督府；还有一部分降附者留在了原突厥领地南部，设立了定襄、云中二个都督府。另外，颉利可汗与一批突厥酋长豪帅加上其他人员有近万家被安置在长安；这些酋长豪帅统统被拜为将军、郎将，其中，五品以上者就有百余人，几乎与原有的朝臣相当。这可以说是唐太宗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大手笔，没有相当的气魄与自信是难以做到的。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他还不无得意地对侍臣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①

东突厥的降伏，使唐王朝在西北方的地位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当时的两突厥因汗位之争，也陷入动荡之中，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有所减弱，因此，西北方的许多部族与国家开始向唐王朝靠拢。但唐太宗对这一形势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没有乘势向这一方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向拓展势力。

至唐太宗后期，当西突厥强盛，屡屡危及唐王朝西北安全之时，太宗方用兵西北，至唐高宗时代，大败西突厥，取得了对中亚的控制权。公元661年，高宗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在吐火罗、呾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设置了八个都督府、七十六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需要指出的是，唐王朝在此所设府州县均为羁縻性质，实际上仍维持原有的统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不变，只是名义上的属地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唐王朝并未以此为基点继续西进，建立更为庞大的帝国，只是以此为藩屏而已。开元天宝之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东进，中亚发生变化，唐王朝在平定了变乱的突骑施势力，阻挡了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后，也未开辟疆土至此，而且还直接册封当地依附者为王，如石国国君被册封为顺义王，康国国君被册封为钦化王，安国国君被册封为归义王，等等，各国仍拥有较为完整的独立性。

在这种崛起的内容之下，中国王朝的任何一次崛起都未扰动原有的世界秩序，更没有吞并或兼有另一个文明体，当然，中国文明也未与其他文明体发生直接的碰撞与冲突，而只是增强了周边地区与国家的向心力，增强了中国王朝的内凝而已。与之相应，则是中国文明一直是在原有基点之上的延展与进步。

阿拉伯帝国起自公元七世纪上半叶，止于十世纪。公元610